

10.02

睢寧文史資料

第七輯



92

22/100

睢宁文史资料

第七辑

(内部资料)

政协睢宁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三月

封面题字：张爱萍

封面设计：晁岱卫

责任编辑：王耀先 李百轮 徐乃耕

睢宁文史资料

第七辑

编辑：政协睢宁县
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新沂印刷厂

工本费：2.00元



李松堂同志



吴季讷同志



唐宏生同志



陆象乾同志



全菊圃同志
36岁时照



焦兆辰教授

團結報

第七期 第七卷 第七期

團結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第四八二期

團結報

第五期 第七卷 第七期

鄧子恢題寫報頭

陳毅題寫報頭

廖意之題寫報頭

目 录

一、我的学生时代·····	李松堂 (1)
二、艰难曲折的历程, 光辉照人的业绩	
——略记吴季讷同志革命一生·····	吴达坪 (33)
三、忆吴季讷同志·····	高云亭 (54)
四、漫天风雨敢同舟	
——略记魏轶凡同志生平·····	王耀先、李百轮 (67)
五、魏美臣被陈彬三“武装请客”事始末·····	吴超忱 (75)
六、抗战时期的魏轶凡先生·····	王 克 (77)
七、爱国民主人士温克臣先生·····	陈昭宗 (84)
八、徐属教育界老前辈仝菊圃先生生平·····	宋立平 (89)
九、焦北辰教授传略·····	周少侠 (95)
十、回忆父亲唐宏生·····	唐修国、唐修祚 (96)
十一、父亲陆象乾事略·····	陆裕松 (102)
十二、先祖父梯升公事略·····	乔文龙 (113)
十三、《团结报》在睢宁·····	王 克 (115)
十四、忆《团结报》初创时的往事·····	梁克朴 (123)
十五、双沟“广济堂”·····	高慰堂 (126)
十六、李集“恒春堂”轶闻·····	贾北虹 (131)
十七、旧事杂忆·····	潘正芳 (138)
十八、清代平民诗人张文醇·····	陈剑彤 (144)
十九、王云峰、傅二槐诗抄·····	夏伯垣 (152)
二十、“睢阳诗社”琐絮·····	王 克 (163)
廿一、《邳睢铜灵参议会始末》补正·····	王 克 (165)
更正	

我的学生时代

李松堂

作者简介

李松堂同志1935年毕业于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机电系，毕业后任南京金陵兵工厂技术员。1937年1月，赴德国留学专攻冶金机械工业。1939年1月回国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重庆廿四兵工厂第二轧钢部主任、资委会重庆资渝钢铁厂主任、资委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协理兼轧钢所所长。解放后历任鞍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兼副院长。历任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政协第四届副主席、鞍山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鞍山市政协六届副主席，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幼年时代

1908年农历七月三日我生于江苏省睢宁县高作官汪村西李庄一个农民的家庭。祖父李怀仑字昆山，父亲名学纯字粹精，二叔名学进。我记事时，家中有田约八十亩，祖父对儿子的教育很重视，二叔因天资较差，上学不久就改学农

活。祖父专心一意地让父亲上学。当时村里无塾馆，祖母背着我父亲到村北杨庄私塾去读书。以后为了深造，又送他到南京理化学堂学习。由于父亲在南京读书，接受了新思想，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并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因此他当时思想比较进步。这对我青少年时代能受到较好的教育继续得到培养有很大关系。

1911年辛亥革命，我已经四岁。一天在院子外边大便，不能进大门，见母亲正为一个革命军人送饭，那军人来不及下马，在马上吃了就走，这是革命军打高作镇的时候。据说父亲已加入同盟会，后来我时常听他说：“革命军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父亲字写得比较好，常年以在城里印刷店帮人写字为生。母亲在家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所以照看我的时间就比较少。也就是在我四岁的时候，一天夜里，我因做了恶梦惊醒了，母亲就叫我睡到她的怀里，母亲另一侧还有一个弟弟，不久，这个弟弟就没有了，于是我就接着吃母亲的奶。二弟比我小九岁，他是后来搬到城里住才活下来的。其间起码死了两三个弟妹，这说明当时农村妇女因生活条件所限，往往孩子生的多而活下来的少。

二、小学时代

我小时候常和别的孩子打架闹事，给家中带来麻烦。七岁时，祖父就在家西另建一个新院子，盖上三间西屋，父亲不再外出工作，改为在家教读，这样不仅自家孩子得到读书，同时也为本村学童就学带来方便。1915年秋天，我开始随父读书。那时塾中仅有学童六人。我用的课本与其他学生不同，他们从读《论语》开始，我读的是《全国小学统一语

文教科书》第一册。记得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大山小石，红黄蓝白黑（当时国旗的颜色）。八册读完后，才接着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书。同时也学习算术、珠算、书法。父亲对书法课要求特别严格，如拿笔时，笔杆要对准鼻梁，头稍歪就挨打。这是我当时最怕的一门课。私塾没有寒暑假，但有年假，一般从农历腊月二十至正月十五日。麦假约在端午节前后，时间长短随农业生产需要而定。

父亲爱养花。平时为人家料理婚丧事。在春秋二季，乡间婚丧事特别多，教书先生常被请去陪客、唱礼，于是学屋放假，我们因而感到高兴。随父读了两年，父亲不能再教下去了，就另请一位能教诗词歌赋的老师代替他，自己又去重操旧业。但旧业已不再是帮人写字而是准备在城里开办石印局。所谓石印，就是先用药墨写字压在石面上，再加油墨，盖上纸印刷。投资则是先接受印东西人的订钱，然后到徐州、南京、上海等地采买原材料和印刷设备，回睢宁印刷交货。1917年秋，我到睢宁县城四年制的城厢国民小学插班读三年级。该校设在孔庙里，校长是国民党的党员。当时县城还有两个初等小学，一个是在南门外玉皇阁办的南门小学，一个是在北门内三元宫办的北关小学，这两个学校的校长也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前者叫张超吾，后者叫王纪官。而在东城门外书院办的三年制高等小学的校长则由地主阶级的代表、共和党人士所把持。当时我县比较穷的知识分子多加入国民党，所以有人叫他们“花子团”，有钱的人则多加入共和党。国民小学的教师待遇低，以国民党人居多，高等小学的教师待遇高，共和党人多跻身其间。

到县城上小学，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在城厢国民小学读书期间，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件事：一是当年秋天参加学校举办的庆祝“欧战和平”的提灯晚会。因为我国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奥联盟军宣战，德奥终于宣布投降了，中国虽然没有直接派兵去作战，但却派了大批华工至法、比等国支援战争。此时全国各地都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二是祭孔，因为学校办在孔庙里，每到祭孔的时候，都要我们学生学唱《祭孔歌》，歌词的头一句我还记得，“大哉孔子……，”祭祀时，我们学生都要半夜时起来唱《祭孔歌》，祭后，每个学生也能分到点祭品中的牛、羊、猪肉等。三是每到中秋节，学生排队，老师发水果。当时校园里种有桃、杏、石榴等果树，我们学生分到点水果时，脸上都露出笑容。

不久，父亲把开办石印局的必备材料和设备都采买齐了，因他熟人多，就在孔庙东院节烈祠内租了三间房，一间住人，两间作为印刷间。招收一个学徒，是 본家远房叔，由他做饭，主食煎饼则由母亲在乡间做好了送来。父亲当写字先生又是印刷工。因这位叔叔年纪较大，不易接受新事物，学习印刷进步很慢。新年后，从徐州印刷店请来严雋藻师傅，又从陵城招来两个年轻的学徒。店也从孔庙迁到十字街口，店铺起名叫“粹精石印局”。这样，印刷的质量提高了，除了印家谱外，还做些印名片、表格等零活。这些零活的利润比起印家谱则高得多，生意蒸蒸日上。我白天上学，晚上或星期天则帮助摺叠家谱装订成册。就这样我读完了四年制国民小学。

家中生意好，手中有了一些余钱，于是就在北城门内买了魏姓的四间南屋，圈上独院。当年十月底，母亲就带着姐姐和

二弟进城了。这时，我每天放学到家除在店里干活外，还得照顾二弟带他玩。他就是今天仍在台湾的李泉。在城厢小学读书两年，比起在家跟父亲读书学的知识面宽广得多了。语文、音乐、体操、算术、珠算、地理、历史、乡土志等课程，都使我感到兴趣。春秋两季，学校还组织学生到官山、龙头山、大李集、城西苗圃等处去参观旅行，扩大我们的视野，增长知识。

国民小学毕业后，应该上三年制的高等小学。但这所学校是共和党人办的，父亲叫我回到高作入国民党人鲍耿光办的“代用高等小学”，读高小一年级（即五年级）。鲍系省立徐州第七师范毕业，与我父亲是朋友。学校距我家仅四里地，因此我也就乐意去了。这所学校是初创。所谓代用，即政府出一半资金，地方筹措一半资金。学校办在私人的两个大院子里。在该校读书有两件事印象较深：第一学期看到宿迁县基督教的美籍传教牧师到我校接收教徒举行洗礼。仪式和一般宣誓差不多，最后牧师给教徒点东西吃，并用手指向教徒头上弹点水，这就叫“洗礼”吧！参加基督教的大都是年龄大的学生，这次有四、五人受洗。牧师自带厨师、餐具，单独吃饭。当时我觉得外国人真洋气。可见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之无孔不入。其次是第二学期，即1919年春，的“五四”运动，也波及到我们学校里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到处张贴“勿忘‘五九’，万众一心”，“打倒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反对廿一条约”等标语。我们学生参加查日货的活动。

由于离家近，自带干粮（煎饼）、小菜，再自做一点熟菜、稀饭，同住在一起的二叔李学贞和房主家的学生李怀柱、李

德太共同自炊。每天放学后，买菜、炒菜、烧锅、洗锅碗，都有分工。一次，我刷锅不慎，右手中指被锅边刮破，至今仍留有疤痕。第二学期，当我和李德太都是学校“号兵”时，他对我说：“现在我们都是号兵了，与众不同，处处都要当人的表率，要注意。”因此我牢记他的劝告，随时检点自己的行为。

父亲经营的印刷生意好起来了。收入日丰，因而在十字街口南边街东巷内买了一所各三间堂屋的两套院子，靠街还隔着孙姓开的染坊院落。父亲将买下的西院三间草堂屋改建成瓦房，从巷子南侧朝北开大门作为店铺正门，又建两间西屋做客房，墙都是里生外熟，即外墙皮是砖砌的，里面则是麦草拌泥筑成的泥墙。为了布置客房，在高作请了有名的工匠做桌椅、书条、茶几等家俱。在高作姚永年家租了他的两间屋，由祖父监工在那里做家俱。放暑假后，我也曾去帮助祖父监工。姚家有三个儿子，长子姚潜修后改名姚尔觉，以后和我家关系很密切。

暑假快结束，家俱做好了，我从高作回到县城，父亲叫我随鲍朝爱一起到徐州市立第七师范附属小学读五年级。这时鲍耿光也到该校任教师。到徐州读书，又一次大转折。学校教育质量高，我见识也广多了。如看到火车、游玩云龙山、子房山、黄河大堤、火车站等使我大开眼界。因为是第二次读五年级，功课都能跟得上。对学的功课感到新鲜。如手工课能用竹子做出调羹来，开了英文课。当时正值推广白话文。但语文课本中新文学与古文并重，作文固然“之乎者也囊满瓮”要用，就是白话中“我的、你的、他的、来了、去了”也要用，古文中的名篇如《桃花源记》、《醉翁亭

记》、《出师表》、《李陵答苏武书》和《左传》中的节选文章等。新文学作品从六年级起分量也逐步增加。寇尉南老师积极介绍我们课余看《晨报副刊》，邵力子主办《民国日报》中的《觉悟栏》，胡适的文章更是常见到的。寇老师每次投稿，要我们学生帮他抄写。到七年级时，增加智力测验的试题最多。我年纪虽比较小，但在智力测验中，得分总是最多。毕业时，我学科总分第一，但因为我好打架，在学生中不孚众望。所以被降为第四名，因前三名可以不需考试直接升入师范学校，这样，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在七师附小读书期间也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如：学校在课外活动中，重视开展武术操和器械操，我对拳术、刀、枪和单双杠等都喜欢。特别踢足球我用的时间最多。每逢星期天，到黄河滩练足球。回校时在路上往往把别人拌摔倒引以为乐事。爱打架也是这个时候发生的。有时到火车站天桥上看火车来往，特别是蒸汽的汽缸通过连杆推动车轮子转最吸引我的注意。

第一学期，我们学生藉孔子秋祭的机会到曲阜孔庙旅行。当时徐海镇守使陈调元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外甥都在我校上学。大家要他们向家长说情，给我们创造去曲阜旅行的条件。后来果真有一天晚上校中通知：明天早四时起床到车站上车去曲阜。我们学生共乘一辆客车，遗憾的是，闹的最凶的几个学生因系走读而未能去，这是我在徐州读书最开眼界的一次旅行。祭孔的仪式就在在睢宁祭孔的场面大得多了。时间在上午，参加祭孔的人有数千人之多，全跪在祭台前石铺的大院子里。这时还有许多外国人来旅游参观的，我们校主任还用英语同他们讲话。我首次看到摄影机和电影摄影

机。除参观孔庙外，还看了孔林、颜子庙和周公庙、万石山等古迹名胜。万石山类似埃及金字塔的形状，不过小得多。

从家到徐州有170华里，那时交通工具是有蓬的马车。我年岁小还带有铺盖行李，因此就和同路的雇人推小土车运东西，结伴而行。中途在双沟镇过夜，晚饭大都是起伙、即店家擀面条，炒点菜，这样吃，既热乎又便宜。路上多半在路旁饭店随便买点吃。

在校开始是随师范生在食堂内包饭吃，时间长了觉得这样不合适，原因是我们比师范生年岁小吃的少，其次是师范生当时除去学杂宿费免交外，就是伙食也由公家包下来，每学期放假时还可以拿到一点膳食结余的钱买点东西带回家去。因此，我就到饭馆随便买着吃了。住宿是集体住在距校不远的天主堂一个后院内，师生同住，宿舍附近有专门为学生洗衣服和缝补的老太太，所以一切都觉得很方便，并不感到他乡求学之苦。

家庭情况变化很大，寒假回家，一到十字街口，“粹精石印局”的招牌不见了，往南走不远，则见东侧挂有“粹精石印局在此巷内”的招牌，这是一个二层楼三间瓦房门面中间开门的很好字号。进店后则见东头两间因料未备齐尚未上楼板，中间是过道，印刷机就安装在东头一间，学徒就住在西头楼梯间的楼上，我回去就临时住在西层楼上父亲休息时用的床上。院内设有门楼与东院相通，门南为高约350毫米的花池子，内种毛竹，南面的空地上则用砖墙砌一公共厕所。以方便赶集的人，也为自家种地增添肥料。由于肥料多，收成好，至我大学毕业时，家庭种的四十亩地，已足够一家人的吃用了。

自店迁至此处开业后，因在巷子内，进出不大引人注目，便于往来客人落脚，所以一到逢集（睢宁城小十天只有四个集），父亲的老相识到店落脚者日益增多。一来是可以休息，二来是他们便于互通消息，解决疑难问题。日子长了，无形中这里就变成大家聚会的地方。当然都是与国民党有牵连的人居多。只要到店来，我父亲都烟茶招待。我印象最深的长者是号叫凌霄的张曙时老大爷。他是县城东南约20多里的张圩人。他在客屋里坐着，称我父亲是老粹弟。他俩在一起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南京汉西门内清凉山下一个家祠内办有建业大学，培养有进步思想的学生。他本人是南京法政大学毕业。客人中青年人以高作镇人最多，大都在外地读书，如郝惊涛、姚尔觉，这两人原在清江（淮阴）江苏省立第三农业中学读书，因搞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才改名转入南京省立一农的。还有朱健，他家庭在高作开布店，也原在三农中读书，后来看郝姚二人走了，也转入南京一农。他们在一起谈话，我年岁小，只能在一旁听，插不上嘴去。但听他们谈起古今中外和国家大事，使我受益不少。他们是学农的，劝我将来还是学工好。认为当教师的出路不大。此外，客人中还有些来县城打官司搞诉讼或买卖枪支的熟人。谈起买卖枪支，因那时土匪蜂起，一些有钱的农户大都买枪自卫。由于长年军阀混战，散兵游勇落在地方上的枪支较多。象我家虽不在乡下住，也得有一支枪在乡下。也有两家或三家合买一支枪的。当时为国民党人写诉讼状最多而又能干的人叫徐馨山，住在县城西不远，城里也有房子，常到我家来和有关人出谋划策写状子，因此，我家又变成国民党人搞诉讼的聚集处。

在徐州我读完高小三年级。寒假到家，学徒就告诉我，家里已经给你订亲了，就是常来的朱健妹妹，比你大两岁。我一听就愣了，但也说不出反对之词，后来见着朱健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最后一学期考试完毕，由于我名列第四，上师范仍要考。朱健就劝我父亲叫我到南方去考中学比较有前途。他们三人在南京上学，张曙时大爷也在南京，所以父亲就决定让我去南方考中学。这又是我一生中的一次转折。

三、中学时代

暑假，到南京住在建业大学内，常到农校看望郝惊涛、姚尔觉、朱健等同乡。

当时各校招生都是把有名望的学校排在前面，发榜的时间也早，考试日期依次向下排，互不冲突，我先报考省立一中，未被录取。这时徐州七师来信，说又要在开学前回校，仍可免试升入师范。我征求同乡意见，大家劝我继续在南方考中学，结果考取了扬州八中和南京工专附设高中部预科。最后决定上南京工专高中预科，这样可以免试升入专门学校。

由于暑假往返于各地考学校，过度劳累我生病了。病中得到张曙时大爷和朱健大哥的照顾，得以痊愈。

这时，我才了解郝、姚、朱三人在一农校的学生会中都负责要职。姚尔觉并当上了南京市学联的主席。后郝惊涛毕业考入山东济南农业专门学校去读书了。我入南京工专附中读书时，舍监宿迁人张逸墨，平时对我多照顾。他是严济慈的岳父。六届全国人大开会时，因严是辽宁的代表和我一起吃饭时，还谈起当年此事。

南京工专附设高中是三年制，加上一一年预科共四年，比